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研究评论】 | 被忽略的历史——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 李 逊 |
| 【史海钩沉】 |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 施宝华 |
| 【乱世人生】 | 戈华冥诞百年祭（上） | 樊能廷 |
| 【难忘岁月】 | 复旦往事（选载之十二） | 吴中杰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研究评论】

被忽略的历史——重视对文革保守派的研究

· 李 逊 ·

研究上海文革史之余，读了不少文革著述，包括许多当事人的回忆。觉得在浩瀚的文革研究资料中，似乎有一个明显的疏漏，即文革中保守派组织的研究。大量文革回忆录作者以当年造反派居多。笔者所能见到的，除了当年武汉的“百万雄师”负责人之一章迪杰撰的《峥嵘岁月》，以及上海市总工会编写的《忠诚于党的上海工人赤卫队》，还有最早的红卫兵，鲜见“老保”回忆录面世。而已有的文革著述中，除了笔者的上海文革研究，以及山西某县文革史，其它著作关于保守派的活动内容，除了最早的红卫兵，也基本未见引自保守派方面的回忆资料。这一点，早在20年前，海外的研究者王绍光和陈佩华便已有提出，但直到现在变化似乎不大。

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史主要由造反派的活动构成。但作为造反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面，许多事件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互动结果。另一方面，保守派组织的活动是执政党文革前十七年运动模式的延伸，保守派力量的兴衰，实质是毛泽东的文革与他的文革对象较量过程的显性彰现。所以对保守派的研究应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保守派组织，既是历史实证，也是理论研究。笔者这篇文章并不在于讨论理论问题，而是希望引起对保守派组织的重视，使文革研究更立体和饱满。

1，保守派的产生

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首先喊出造反口号，但从他们以后的行动看，他们既是造反者，又是顽固的保守派。在冲击不准自由结社的社会制度方面，他们是造反者，因为他们冲破了执政党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的严密控制，成立了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组织——红卫兵。而在此之前，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社团存在。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其体制外的组织形态，成为不久全社会结社自由的开端。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开端，是对共产党严密社会控制的造反。而在最初的批判对象上，他们

也可算是造反者，因为他们的反叛从反对学校党组织和工作队始。在此之前的十七年，执政党从来不允许对各级党组织说“不”。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及反校党组织和工作队都是反体制的造反行为。所以从这点上说，这批干部子女应该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者。不过，这种造反主要发生于北大附中以及率先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清华附中等少数学校。在其它干部子女云集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成立的，学校党组织不敢反对。

但是，这批造反者并没有将“造反”的桂冠保持多久。当毛泽东明确表达对他们造反行为的支持后，外在的政治压力消失，他们马上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十七年一贯的革命对象，还加上学校老师和同学。他们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将在此之前各级党委发动的对知识精英以及前政权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迫害，推向新的高潮和更大规模范围。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这批红卫兵和共产党的一贯目标完全一致，他们的暴戾是阶级斗争学说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他们对文革前便已形成的政治等级身份制不但坚决维护，而且极力扩大和固化。而政治等级身份制正是十七年政治统治的核心。他们宣扬“血统论”，就是为了消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对教育资源的威胁，独占革命接班人的地位，以便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的政治要求，只止步于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

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他所认为的各级“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这些新的革命对象，正是以干部子女为骨干的第一批红卫兵的父母，这令第一批红卫兵不能接受，本能地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因此，在对文革批判对象意义上说，他们是保守派，而且是最顽固的保守派。而 they 与不久崛起的造反派从一开始就非常对立，以后也始终不愿意与之伍。他们自始至终的行为便是反对造反派对各级干部的批判和冲击。所以从文革政治派别的意义上说，他们也应该被划入保守派。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全国各地第一批红卫兵组织都是北京模式的翻版：核心人物都是各级干部子女，批判对象都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继续；抄家、打人、破坏文物；当然也都狂热鼓吹“血统论”。也和北京最初的红卫兵一样，他们不久都成为保守派。所不同的是，他们从成立伊始就是保守派，不像北京第一批红卫兵那样至少还有反体制的开端。而且由于毛泽东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其它省市第一批红卫兵组织成立，几乎都有各省市党委的支持和扶植；不像北京第一批红卫兵，成立时遭到学校党组织的反对。

第一批红卫兵的血统论，激化了其它阶层子女的逆反心理。1966年9月6日，以平民子女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三司”的批判锋芒直指“党内走资派”。

接着，因这些造反派红卫兵的榜样和支持，工人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反派组织很快成为文革主流。而正是在对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上，真正形成了文革的两大派别：造反派和保守派。所以秦晖认为，文革初期正式政治派别意义上的保守派，就是随着这批造反派的诞生而被确认。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最初分野，在许多学校和工厂是因为对工作队或党委的不同评价。保守派拥护工作队或党委对分歧的裁决权。而造反派则反对党委和工作队的裁决权，认为应该对照当时的报刊社论以及《十六条》，因为这传递了毛泽东的文革主张。造反派实际是试图将裁决权抽象化，突破十七年一贯的党的干部说了算的话语权和对真理的解释权。这是造反派最初的造反行为。而保守派最初没有这样的思想突破，以后也始终基本服从新的权威和权力的裁决。

2，保守派及其组织活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

文革的对象是干部阶层。还是在1965年1月，毛泽东制定的对农村“社教”的23条中，第一次提出整“走资派”的思想。接着在同年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又明确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为新一轮革命对象。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将文革对象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炮打司令部”。

但各级党委包括派往各学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并没有悟出毛泽东的批判指向。他们纷纷抛出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作为打击对象。当有人贴出大字报质疑，即使十分温和，他们立即条件反射地出手反击，发动群众围攻那些提意见者。在这样的围攻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最初雏形。那些被围攻的提意见者日后大多成为造反派；而跟着党委或工作组围攻提意见者，日后很多人成为保守派组织的核心或骨干成员。

保守派的活跃时期真正开始，是在1966年9月以后，各级党委普遍遭到冲击。而此时中央决策层因对文革的不同看法，传递到底层的对造反派支持态度不是十分明晰。于是对省市的评价，分化出文革群众派别意义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地都有保守派群众与造反派辩论以及保守派组织“保卫”省市的行动。到1966年年底，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的分歧更发展成冲突甚至流血事件。例如1966年12月4日重庆的“12·4事件”，1966年12月30日上海的“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南京的“1·3事件”，1967年1月26日新疆的石河子大规模流血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看起来是底层民众两派的冲突，其背后是中央决策层的文革势力和抵制文革势力的较量。

1967年初，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三个最高机构，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发贺电，表达了支持造反派的明确而坚定态度。造反派组织对保守派组织的强行取缔和武斗围歼在全国范围展开，各地保守派普遍遭受重大打击。在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以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掌控了上海的大局，文革新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造反派和拥护文革者占了优势。即使是被“三结合”的老干部，也都是下决心紧跟文革者。保守派组织即使想死灰复燃，在市革委会中也找不到同情或代理。但这样的情况只是少数例外。在大部分省市，文革新政权革委会中干部和军队对文革的态度尤其是对造反派的反感态度，给予了保守派组织重新生存的空隙。有些省市的保守派换一面旗帜重新整合自己的力量，例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广西的“联指”。更有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连旗帜都不换继续存在，例如成都的“产业军”。尤其广西和广东，因为军队的支持，保守派始终占强势地位。

绝大多数支左部队对文革的态度，与原来抵制文革的地方党组织基本一脉相承。因此1967年至1968年各地的武斗事件，许多看似保守派组织与造反派组织冲突的事件，背后仍是干部阶层对文革的抵制。最轰动全国的是武汉“7·20事件”，以及四川遍及全省的动用武器弹药的武斗。而保守派占优势的广西，武斗更是持续一年半，大规模杀人尤为惨烈。所有这些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造反派挑起的。可以说，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年底，全国各地许多重大事件或武斗冲突，许多都与保守派组织有关。这是保守派背靠文革新政权与造反派的继续对立。所以，保守派的活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少了保守派的活动轨迹，文革记载便不完整。

3，保守派组织是十七年政治运动动员模式的集中体现

保守派组织的活动轨迹，就是十七年运动群众的模式，或者可以说是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员模式。

1966年6月，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全国掀起大字报高潮，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各级党委讨论圈定并抛出本单位的运动对象，组织群众写大字报。那些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业务拔尖的学科带头人，还有“出身不好”者、“政治历史复杂”或“社会关系复杂”者，被纷纷抛出。而在工厂，一些技术人员和资方人员也被党委抛出。这样有准备地抛出批判对象，形成人人口诛笔伐的氛围，给被批判对象以强大心理和政治压力，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

但这样的模式在文革初遭到质疑。对照《十六条》，有人认为党委首先应将自己作为这一次运动的对象，于是给本单位的党组织或工作队贴大字报，但立即遭到党委有组织的围攻。在这个后来被毛泽东称为“资反路线”的50天中，各级党委发动群众保卫自己，打击和围攻提意见者。这样的做法也是以往政治运动的延续，尤其是从反右运动之后的一贯做法：凡是给干部提意见者都是心怀不满分子或反党分子。这是造反派最初造反的原因。不过，绝大多数造反派造反，并不是从人权的普遍意义出发，而只是从自身被批判打击的特殊性出发，所以他们对比自己政治地位更低者例如“地富反坏右”没有同情心。这种情况同样体现在保守派身上。

最初的保守派是在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冲击各级党委时产生的。他们不同意对各级党委的批判，以各种形式保卫党组织。在上海，1966年8月底和9月初，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上海市民以对上海市委的评价，分成不同观点。许多市民去上海市委办公大楼门前与北京红卫兵辩论。更有许多工人去市委门前“保卫上海市委”。市委门口贴出了许多为上海市委评功摆好、反击北京红卫兵观点的大字报。其中最著名的有两篇。一篇是以国棉二厂的老工人名义写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另一篇是以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人物杨富珍的名义写的《给毛主席的急电》。两张大字报都被印成传单，不但在上海广为散发，全国其它城市也都有传抄翻印，影响很大，是文革初期保卫省市市委的典型文字。

看起来，“保卫上海市委”的行动以及大字报都是工人们的自发行动。但不久便有传单揭露，说两张大字报的真实作者是上海市委干部和工厂干部：《我们老工人要说话》是上海国棉二厂党委组织的，起草者是党委的秘书；《给毛主席的急电》是驻厂的市委工作队向市委请示，得到市委书记陈丕显同意后，由工作队撰写的。其它这一类的保卫市委的大字报，也大都都是基层工厂或主管局、公司的干部们组织或暗示撰写的。而大批去市委门前与红卫兵辩论的工人，都是应市委要求由下面各工厂党委派出的。被组织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为了显示工人们是“自发”去保卫市委的，出面组织的工厂干部特地关照：若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己去的。

这样的以工人名义出面说话，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贯路径。《我们老工人要说话》，从1957年“反击右派”，到1966年的“保卫省市市委”，到1989年的“反对动乱”，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内容，以“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的双重的名义一再重现，严厉斥责任何对执政党的质疑，正义正气正能量。只是过去暗箱操作，文革中终于被揭露出“自发”背后的捉刀真相，让人明白那些看似汹涌民意的背后，是权力操纵为官方代言的实质。这样的政治留痕使得以往和以后的“自发”都失去了崇高，成为你知我知人人皆知的虚假政治游戏。

和“要说话”之类的政治表态一样，保守派组织的成立，也与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大多数省市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成立的保卫省市市委的保守派组织，都是各

级党委明里暗里扶植的。即使在上海，虽然保守派组织不是市委直接出面组织的，但也与市委的默许和大力支持有很大关系。保守派运动看上去很热闹，其实都是党委的导向和意志。

而在之后的1967和1968年，各地保守派组织也与文革中的主流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保守派组织最本质的特征——没有自己的主体意志，跟着执政者的导向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即使是后来造反了的保守派，也始终不改听话本色，过去是听各级党组织的话，夺权后听文革新政权的话，包括对地方文革握有重大话语权的支左军队。而群众组织对保守与否的鉴别，也从1966年底的与各级党委的亲疏，变为与革委会或支左军区关系的远近。所以，尽管文革的各个时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和保卫对象会有变更，但他们与主流政治的亲近关系没有变更。事实上，保守派组织的主心骨在1967年全面夺权前是各级党组织，全面夺权后就是各级革委会中的反对造反派的干部们。

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造反派在大多数省市得势时间不长，革委会成立以后，造反派重新成为整肃对象。十七年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模式重又回归，许多地方的保守派参与了这个回归。而保守派参与秩序和权威回归的过程，正是文革目标渐行渐远的过程。到1976年，原来一度不得不向造反归顺的保守派，又重新站到了造反派的对立面。而造反派中的许多人，也开始怀疑毛泽东和他的文革，于是发生19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文革结束的社会基础。

弄清保守派的活动轨迹，就是理清文革中权力的运行轨迹，以及民众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打通毛时代和后毛时代的共同点，有利于更深刻地总结文革乃至整个共产主义革命的教训。

4，保守派的类型和区分

与造反派一样，保守派也有不同类型。一类是真心认同和拥护十七年者，以劳模先进人物和党团员为骨干。他们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受益者，有着强烈的翻身感，更对给了他们荣誉的各级干部有着强烈感恩。他们看不惯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1967年“一月夺权”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后，他们迷茫困惑。过去的努力和荣光反成为负资源，他们也曾因此努力迫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跟上文革。但首先情感上就与造反派始终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从行动上淡出文革。之所以说“从行动上”，是因为他们仍然反感文革，只是不再以行动抵制。上海文革初期工人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的主要负责人王玉玺、陈阿春、李剑钰、马骥等，大多是这种类型。这些朴实的工人，坚守自己的良心和直觉，又无法超越毛泽东和党的权威，只能沉默，以沉默表达对文革的不认同。

第二类是努力跟上文革形势者。当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对造反派的支持后，他们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不但揭发当初支持他们的各级干部，而且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当初是“受蒙蔽”的，以这样的表态开脱自己，表达对文革的认同，从而延续他们文革前被各级党组织信任的政治身份。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政治和体制身分，例如文革前的上海著名先进人物杨富珍，宣布造反后，一次又一次地检讨自己“被旧市委利用”，从而成为劳模先进人物“正确对待文革”的典型，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人；文革中当了上海普陀区委书记。

第三类是1967年一月夺权后改换旗帜宣布造反者。但他们即使造反，也始终和原来的造反派貌合神离。他们中有些人是文革初期批斗“黑帮”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人有侮辱和殴打批斗对象的行为。宣布造反后，他们与之前的造反派颇多冲突，甚至酿成大的武斗事

件。这些冲突有的是因不同观点例如对某个干部的评价引起，有的则是对文革新政权席位的纷争。

第四类保守派是强权的追随者，谁有权便紧跟谁。文革初期他们保各级党组织，与其说是出于对党的热爱，不说是向权力表达忠心。文革中他们跟着新的权力，例如支左部队。哪怕新的权力大开杀戒，他们也跟着参与杀戮。上面第二、第三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可列在此类。

而大多数底层群众参加保守派组织，是因为安全。这是他们从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得出的经验。1966年10月前，中央决策层传出的对造反派的支持态度不是十分清晰，信息显得不确定，解读不一。最安全的选择，就是继续跟着原来的权威，即还在台上的那些干部。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是这一时期保守派占大多数的原因。以后，当造反派得势，保守派全面崩溃，许多人弄不清文革的形势，也不愿意参加造反派，于是成为逍遥派。

1967年一月夺权后，各级党委被打倒，保守派组织的捍卫对象不存在了。“保守派”也成为抵制文革的代名词，没有哪个组织再会理直气壮地自称保守派。而1967年全面夺权以后，将对立派组织指为“老保”，从而取消其参加文革运动的资格，更成为最常见的派性争斗方式。上海柴油机厂1967年上半年，“联司”和“东方红”，都开足马力指责对方是老保组织”，武斗冲突不断。但事实上双方都是造反组织。

当时将对方指为保守派组织有各种理由：有的以1966年文革初期的政治站队为标准，将曾经“保”过各级党组织者指为老保，即使这个组织1967年以后“反戈一击”改旗易帜。有的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为标准，将党团员多的组织指为“老保”。有的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为标准，把与夺权后成立的革委会或支左军队关系密切的组织指为“老保”。

除了原来便是保守派的组织，一些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也被指为保守派。例如清华大学的“414”。所以，文革中指责对立面组织为“老保”的理由，标准不一，许多时候甚至只是打倒对手的借口。

文革结束后，保守派和造反派被作为文革中的不同政治倾向，不少文革研究学者提出自己的区分原则。

最早研究中国文革的国外学者例如李鸿永、罗思典、陈佩华和裴宜理等，以“社会冲突”的理论分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认为保守派组织的特点是党团员、劳模先进人物多。这其实也是中国每个文革经历者的切身感受：最初的老保组织的核心和骨干都是共产党的依靠对象，参加者也以党组织所信任的积极分子为多。

而中国的学者对如何区分保守派和造反派也有着颇多观点。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一书中，将如何区分保守派组织定为六个标准：支持还是反对工作组；支持还是反对“血统论”；回避还是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维护还是反对各级党组织；“二月镇反”中是帮凶还是挨整；主要斗争对象是党外“阶级敌人”还是党内“走资派”。

周伦佐在《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根本区别》一文中，将追随毛泽东的何种理念作为区分标准。认为保守派“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造反派“实际追随的是1966年10月以后的毛泽东——及其‘路线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思想”。

印红标在《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一文中，将对权力来源的认可作为判断标准。指出：保守派认可的权力来源是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党的领导，所以他们会保卫各级党组织；而造反派认可的权力来源是毛泽东，跟着毛泽东的文革批判和打倒各级党委；至于干部子女红卫兵，他们认可的权力来源主要是自己的红色血统，不那么把工作队和学校领导看在眼里，更不接受对上层干部也即自己父母的批判。

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干脆明确地将“矛头向上还是向下”作为区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标准。

所有这些标准的核心都是革命对象的不同。也即革命对象是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继续，还是干部阶层本身。这可以从与以干部阶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的亲疏关系鉴定：夺权前是与各级党组织的关系，夺权后是与革委会或支左军队的关系。1967年一月夺权时期，虽然造反派取得全面胜利，但这个时期很短。毛泽东的文革没有改变十七年政治规则：只要掌权，就掌握话语权和真理的解释权。随着军队支左全面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大批老干部被“三结合”进文革新政权，文革前的干部阶层全面恢复了原有的权力和权威。这个恢复过程与对造反派的不断打击清算同步。而在这个过程中，保守派势力始终是干部阶层的同盟者和群众基础。所以，文革各个时期保守派组织的名称和保卫对象会有变更，但他们与干部阶层的亲近关系不会变更：在1967年全面夺权前是各级党组织，全面夺权后是各级革委会中的党政军的干部们。区分造反派与保守派，就是观其在文革各个阶段与权力的关系。而大多数党政军干部虽然进入文革新政权，但与不断找他们麻烦的造反派始终不融洽，更容易倾向保守派。

不过，上海是个特殊例外。上海在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后，王洪文坚决主张大力吸收保守派进造反派组织，从情绪和组织上瓦解了保守派。保守派组织不复存在，造反派全面掌权。所以上海亲主流政治的是造反派。这样的现象也与上海市民的政治性格有关：重技术轻政治，讲实际反空头，尊重秩序，反对极端。这一政治性格不但体现在保守派身上，也体现在上海的造反派身上。这也使王洪文和他的造反组织被一些更激进的造反派视为“保守”。这是另一个话题。

5，保守派思想和话语的扭曲性

如果剥去那些带有强烈时代特征的话语外壳，人们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文革对秩序和权威的颠覆，反对暴力和无序。而敬畏既有权威和秩序，尊重既有价值和现实，这样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会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这些文革最初的反动派称作保守派，是比较确切的。这是保守派最可贵的价值，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

但是，如果把文革中的保守派等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派，似乎也不尽然。因为文革中的保守派是对1949年革命与造反形成的统治秩序与价值观的“保守”，本身是对上一次“革命”与“造反”成果的坚持，并未抛弃“革命”与“造反”的核心价值观。真正的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派有着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伦理，对于任何变革传统和秩序的激烈革命，始终抱着警惕和审慎。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靠破坏旧有秩序取得政权的。十七年的强权与教化，早已形成新的秩序，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但这样由革命形成的新传统，有许多与普世价值及中国文化传统相悖。文革中保守派保卫的是对上一次革命也即1949年后所形成的统治秩序与价值观，并不是对普世价值的坚守。

徐友渔指出：一个革命政党依靠破坏旧秩序夺得政权后，天长日久，也会形成新的、自己的传统和正统，在新语境之下产生的革命或保守，自然就具有一定的扭曲性和复杂性。谈文革中的保守，是相对于新传统而非老传统。这样的扭曲可以从许多话语中看到。例如保守派反对造反派打倒一切，呼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执政党十七年所一再宣扬的，似乎很宽宏大量。但这个话语的背后是严酷的阶级分类，意味着那些“团结对象”不是自己人，“团结”他们是宽大和恩施。这样的“团结”话语就有了某种扭曲。于是到文革时期，绝大多数“团结对象”被打回非我族类原形，被收回“团结”资格，遭到残酷迫害。而保守派要捍卫的，不是那些被迫害者的人身权利，而是文革前的“团结”政策。

朱学勤认为，文革话语因当年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势打造，严重扭曲相关汉语原有含义。如“造反”、“保皇”与“保守”：“造反”的汉语原意是对最高皇权与统治秩序的背叛，但在文革初期的绝大多数“造反”中，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现象，是奉旨或领旨“造反”；“保皇”一词来自法国革命及其后续话语，专指当年的王党与拥护皇室的正统派与拿破仑派，但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却被用来指称一时未能领悟毛泽东意图的另一派群众；此后周恩来等建议改称“保守派”。“保守”本为政治学、社会学专用话语，并无褒贬，但在这里貌合神离，虽弱化一格，却还是贬称，并未消减政治歧视。而在另一方面，当年的“造反派”在吸收、消化大量“保守”组织与群众后，又发明另一名词“老造反”，以强调自己“造反”最早，其实是对当年等级身份制的红色顶端——“老革命”身份的模仿，保守而不自知。

所以，文革中的保守派坚守的是十七年革命制定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他们不反对阶级斗争，他们反对的只是过于激烈的嗜血。但也有部分保守派，尤其1967年以后的保守派例如在广西，对生命的践踏比造反派有过之无不及。

保守派与其说是对文革有看法，不如说他们更多的是对造反派看不惯。看不惯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以及对秩序的破坏。不过保守派不可能坚守自己的切身感觉，1949年后的中国，不允许任何与执政党理念不同的独立思想存在，失去了个人权利的任何派别，都不可能坚守自己的政治伦理。

事实上，保守派中的许多人并不反对文革前对沉淀了多少代的习俗和秩序的颠覆，甚至也不反对文革初期对文化和传统的破坏。第一批干部子女红卫兵的“破四旧”席卷全国，其破坏性比历史上的历次战争更彻底更无微不至。除了干部子女，许多保守派也都是“破四旧”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最起劲参与者。例如在上海复旦大学，“破四旧”和“斗鬼风”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很多都成为复旦大学保守派组织“红卫兵大队部”的成员。以至于日后复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回忆起1966年夏季的红色恐怖时，都说是“老保干的”。

保守派中向文革对象下狠手而毫无同情心者不在少数。不但在1966年的政治迫害中，而且当1967年和1968年军队掌握各地权力，对造反派清算和对“地富反坏右”大开杀戒时，许多地区都能看到原保守派组织成员的积极参与。

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毛泽东文革的响应者，造反派奉旨造反；志在“打倒”；保守派没有及时领悟旨意仍停留在原来的行为模式，仍坚持“捍卫”。保守和造反在于领悟圣旨的时间差。无论捍卫还是打倒，都是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更是为了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心。当然，真正反对破坏文化和传统者应该始终存在，但持这样观点者不会是文革积极分子，很可能倒是文革对象，极少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

6，加强对保守派的研究和资料收集

文革结束后，彻底否定文革，发动者的责任，被完全转移到造反派头上，大批造反派被审查。保守派没有被追究，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是文革最早的迫害参与者。

对造反派的清查资料构成了丰富的文革档案：从个人的交待包括造反动机及对各个事件的参与等，到各种各样的旁证包括相关人员的揭发交待或当时的会议记录、传单小报。由这些清查资料能拼出许多事件的脉络走向。但是，在清查档案中，缺少了同样参与事件的保守派资料。即使有保守派的文字，一般也只是证词。而且大多是造反派如何迫害他们的证词，却没有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回忆，更没有他们的行为与原干部或支左军人关系的回忆。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显示他们是如何被操纵和利用的。其实，保守派也有交待材料，而且应该曾经数量不少。但那是文革中他们被造反派迫害审查时的交待。文革结束后，这些资料作为迫害个人的文字，大都销毁或还给了本人，地方档案馆很可能很少有保留。如今，保守派的资料大多见于当时保守派组织的传单小报，个人回忆极少。不过，他们当年的工作笔记或日记应该有部分留存在世；归还他们的文革交代，有些人也会保留。当然，这样的收集很费功夫。笔者就曾经收集到一套当年上海赤卫队成员写的交代。

对比保守派回忆录的缺位，造反派对文革历史回忆的参与非常踊跃。目前境内外出版的大量文革回忆录，基本都是造反派写的。在这些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鲜活细节：最初的造反动机，造反组织的崛起和活动，以后又如何遭到清算，更有对许多事件场景和人物的描写。虽然有些回忆不乏美化自己或回避开脱责任，但至少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为研究者和后人对照其它史料去伪存真提供了依据。而在文革研究者的名单中，我们更可以看到许多当年的造反派或持有造反派观点者：杨曦光、徐友渔、秦晖、印红标、杨继绳、宋永毅、何蜀、周伦佐、余汝信、徐海亮、周孜仁、石名岗等等。但当年的保守派，至今在做文革研究者，笔者所知道的，只有我自己，我当年是上海的中学生保守派。此外，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卜伟华，文革史《砸烂旧世界》的撰写人也可算是保守派。

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撰写回忆录者倒是不少。如前联动重要成员邹建平，化名钟雪写了《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记实》。血统论对联的鼓吹者谭力夫化名谭斌，写了本《赤子白话》。“西纠”负责人孔丹口述了《难得本色任天然》（米鹤都执笔），北岛编的《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中，也有老兵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录回避了许多重要史实，对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尤其自己参与的暴力行为语焉不详。例如：1966年8月的抄家行动是如何决定和发动的？是红卫兵自发的行动，还是被有所组织或暗示？如果是自发行动，是哪个中学哪个组织首先行动？行动之前如何决策？首先被抄家的是哪些对象？抄家名单如何制定？根据什么原则制定？那些人参与制定？又如，北京的驱逐黑五类行动以及北京大兴县的大屠杀是谁决定？更不说在回忆录中提及文革初期的打死人名单和施暴者名单。至于其它保守派组织，除了上海的“工人赤卫队”、武汉的“百万雄师”，也鲜见他们的回忆录。许多事件至今仍是谜。例如上海“4·12炮打张春桥事件”与军队的关系；“7·20事件”与武汉军区的关系，等等。而文革中后期也有许多与保守派可能有关的未解谜团。例如广西和湖南的屠杀和吃人事件究竟因何发生，等等。即使现在可以见到的少数保守派的回忆，例如武汉“百万雄师”负责人的回忆录，也使人觉得似乎缺失了许多情节。所有这些，是记忆流失，还是有意无意甚至刻意的回避？

造反派积极撰写回忆录，与他们文革后的境遇有着很大关系。文革结束后，造反派被清查，一些人被判刑。部分省份“揭批查”扩大化，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下发1982年9号文件予以遏制，但在某些地区被停止执行。如河南省有两千四百多造反派被突击判刑，更多的人受审查或不予重用。这些年河南等地毛派群众屡屡发生群体事件，即与上述历史遗留

问题相关。造反派们不服于将历史的责任全归于他们，他们要为自己辩护，但他们的辩护话语大多仍来自毛泽东文革话语。

造反派中的一部分人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识及个性，不安于现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自我设计。他们最初由反对压抑个性的政治等级身份制而造反，而反抗官府是中国文化的民间传统。这使他们甚至有种失败的悲剧英雄情结。文革是与他们人生紧紧相连的特殊时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对不少人来说，文革甚至是他们人生的巅峰。他们不满意自己这一段人生被彻底否定，他们要留下资料，让后人评说。文革后再看有些当年的造反派，透过文革式炮轰、火烧的话语外壳，是对当政者的质疑，这是被毛泽东“大民主”催生的朦胧的权利意识。这种对当政者不断质疑的思考，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又进一步质疑体制的弊病。1967年至1968年各地都有由造反派写出的独立思索文章，例如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即使是比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例如清华大学的“四一四东方红战团”，也写出《414思潮必胜》。文革结束后，一些人考上大学，成为学者，更试图从理论和认识高度剖析那些始终与文革经历纠缠在心头的问题与困惑。

而保守派，虽然也在“彻底否定”之列，但没听说谁因为当年参加保守派组织而被清算审查，更尚未听说有人因此被判刑。保守派没有诉求和自我辩护的强烈愿望。事实上，对一些参与过暴行的老红卫兵或参加过武斗的保守派来说，许多事情不是需要澄清和自我辩护；而是相反，淡忘是他们对自己最好的开脱和保护。保守派始终是权威话语的服从者，以官方准则为自己的思维准则，在这方面的思维能力似乎远不及造反派，文革中就几乎没写出过有影响的文章。除了干部子女红卫兵的“三论造反”。即使“三论造反”，也是通篇谩骂而无说理。而工人保守派，文革中许多文章都不是他们自己写，许多工人保守派组织的成立宣言多由党委秘书代笔。而在与造反派的笔战中，保守派传单的数量和煽动力也远不及造反派。文革结束后，他们也缺乏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自觉和动力。他们高度认同对造反派的批判，满足于彻底否定文革。在彻底否定文革的话语中，他们的形象是正面高大的，所以不希望重提当年被操纵利用的尴尬角色。

徐友渔认为：造反派的擅长是进行社会动员，掌握民间话语权，写回忆是这种能力的表现；保守派的擅长是体制内运作，获得实际权力，面对公众的语言表达是其所短。各有长短，难论高下。

文革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应该足以销蚀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恩怨，何况这样的恩怨由一个非常时期强加。武汉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两派群众组织的骨干人物，早在2007年便握手言和，消解了当年的对立情绪。如今，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已经进入老年，超脱文革和派性语境，抢救文革记忆，已经迫在眉睫，不但抢救造反派的记忆，也抢救保守派的记忆。^①

① 本文引用文字，除了文中写明文章或书籍题目的，都来自笔者与被引者的信件往来。

□ 原载《记忆·REMEMBRANCE》2019年第一卷第一期

~~~~~  
【史海钩沉】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 施宝华 •

## ◇ 发现·忧虑·建议

1972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秦惠?归返阔别了近三十年的祖国。那时，祖国处在“文革”时期，李政道参观了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发现教学和科研院所的工作秩序很不正常，基础科学研究被严重忽视，科学人才培养的路子不对头。他对此颇为忧虑。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妇再次踏上祖国故土，他看到祖国各科研院所、高校的基础科学研究和科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比两年前看到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参观时，发现学校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处于停滞状况，物理系唯一的“研究”活动是测量一种电灯泡的性能。绝大多数师生都被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留校的少数“工农兵学员”，虽然政治热情很高，可是，他们的科学基本常识都十分欠缺，有的近乎是“科盲”。

李政道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在参观、座谈等交流活动或与各级领导会见时，碍于自己的身份、情面，不能把看到的问题向领导、同行直抒己见，只能从正面提出希望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深深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的科学家，如果不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提出来，真是于心难安啊。几经考虑，他决定趁这次回国的机会，向中央领导人写封信，郑重建议祖国要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政道白天忙于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和进行讲学，晚上回到住地提笔就赶写建议。在写建议的过程中，李政道提出一个观点：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应从娃娃抓起，要从十二三岁的少年中选拔优秀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了阐述这个观点，李政道希望找到一些例证，最好是国内已有的例证来说明。但是，他一时苦于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无法找到合适的例子。

这时，一心关注李政道事业的夫人秦惠?女士想起了一件往事：1972年，李政道夫妇首次归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李政道夫妇。当时，秦惠?女士与江青相邻而坐。她记得，在席间，江青曾向她夸耀上海芭蕾舞学校培养年轻演员的成功经验，说他们在十来岁的少年中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孩子，到芭蕾舞学校既学文化，又学芭蕾舞技艺。并说这是一条很成功的经验，云云。秦惠?把这件事说给了李政道听，李政道兴奋不已，并向接待部门提出，今天不去观看上海芭蕾舞团演出了，希望能安排去上海芭蕾舞学校参观，看看他们是如何培养芭蕾舞演员的。

5月中旬的一天，李政道夫妇来到上海芭蕾舞学校。他们仔细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询问了学员选拔的标准、程序，教学安排、学生专长、成才情况，观摩了芭蕾舞教学，看了学生们表演的节目。李政道兴致极高，他认为，芭蕾舞学校，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很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也可以参照芭蕾舞学校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做法。

李政道在以《参观复旦大学后的感想》为题的建议书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祖国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要培养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队伍，这支队伍只要占人口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比例即可。如果现在不抓基础科学的建设，十年以后将出现严重后果甚至是危险。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基础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创造。李政道提出，完全可以参照选拔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李政道说，选拔十三四岁的孩子集中培养，到十九岁就能达到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当然这些孩子必须具备：（1）有极高的理解能力；（2）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已有结论，富于斗争精神；（3）有过人的记忆力。李政道说，这些选拔出来的少年在六年的学习生活里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学生既要学习数、理、化，也要学语文、外文、历史、体育，并

适当参加劳动。这种培养尖子人才的学校，应当配备优秀的师资和适用的教材和教学设备。李政道最后说，他考虑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条件这样做，所以才下决心提出这个建议。

建议书写好后，他并没有马上送给中国有关部门。5月下旬，他到达北京后，特地找了老朋友、著名医学家黄宛教授，请他看看行不行？黄宛教授看了认为，李政道先生提出建议是很好的，意见是中肯的，建议的思路是值得研究的。

黄宛的看法使李政道很受鼓舞。当晚，他在北京饭店的住处，又用中文认真誊写了建议书，并写了一封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在信中，讲述了写建议书的动因和酝酿经过，并希望周恩来总理阅后如认为“有可取之处”，敬请转呈毛泽东主席，请他批评指正。

第二天，即1974年5月22日，李政道就把自己在西南联大的老学长、一同赴美国留学的朱光亚先生请来。把建议书和致周恩来的信一并交给他，请他呈报给周总理。朱光亚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是中国方面指定接待李政道的官员之一。

#### ◇ 人民大会堂西厅的“争论”

周恩来总理很快看到了李政道的信和建议。他极为重视，在5月24日晚，他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就主持了对李政道夫妇的高规格大型会见。

参加会见的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郭沫若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陪同会见的有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王淦昌、张文裕、周光召以及黄宛等近20人，还有迟群、谢静宜，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

周恩来主持会见。他首先告诉李政道，你写的信和建议书已经呈报给毛主席了。“今天，还是请您先讲讲你的想法好不好？”

李政道听说他写的建议和信已呈报给毛泽东主席，感到很高兴。

他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开讲了。他从什么是基础科学，什么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基础科学与国家、社会、科学发展的关系讲起，又介绍了他在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芭蕾舞学校的观感，还阐述了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内容。

在李政道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江青就显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她对李政道讲话本能地显出反感、抵触和不耐烦，忍不住想“批判”他几句。

当李政道提出可以像上海芭蕾舞学校那样在十三四岁的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时，江青反问说：“五十岁就不行了？”李政道当即回敬：“舞蹈人才不是从小开始训练的吗？”江青见李政道“顶”了过来，马上又打断李政道的话：“舞蹈，是有持续性的。”李政道迅即针锋相对顶了一句：“基础科学也有持续性。研究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时候。所以，也应该在年轻时开始训练，也许在十三四岁，或更早一些。”

李政道接着就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少年的标准作了解释，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要有较高的理解力，二是要有斗争性，敢于提出问题，敢于怀疑，三是记忆力。……这时，江青回敬说：“你讲的选拔标准有一条叫要有‘持续斗争性’，这有点道理。就是要有持续斗

争性！理解是一个条件，但持续斗争性应该放在前面。如果没有持续斗争性，什么都干不成。当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主席思想领导的党。”

李政道对江青的说法未必同意，但考虑这不是原则问题就没有反驳。不料江青突然又拔高嗓门嚷起来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很复杂，我就不相信科学比意识形态更难！在座的都是搞科学的，都是二三十岁才出来的，十六年寒窗啊！”江青显然反对要用培养芭蕾舞演员的办法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反对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员。江青看看会场上没人响应她，也发现自己失态和太霸气，于是，她故作轻松地问：“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顶了牛啦！小谢，你讲啊！”

谢静宜受宠若惊应声上阵，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不知道这位“小谢”是何许人也，便直言与之相辩：“为人民服务，这不错。问题是用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也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谢静宜辩解：“这和社会制度有很大关系，科学要为社会制度服务。主席讲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谢静宜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辩解，连江青都听不过了，对谢静宜说，“你领会错了，他（指李政道）讲的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国家才做得到。”江青的指斥，使谢静宜低下了头。

主持会见的周恩来总理也许觉得一个会见华裔美国科学家活动的谈话氛围弄得如此紧张有失大国风范，他出来讲话希望调整一下谈话气氛，他说，“毛主席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曾讲到，一机部搞过一个41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这些科学家、发明家中有些是社会地位很低的，不少都是穷苦的工人。它告诉我们（对人才问题）要破除迷信。”他接着对坐在第一排的几位科学家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李政道的建议）可不可以试验一下？”

在场的科学院负责人周荣鑫见没有人说话，便表态：“可以研究、探讨。”周恩来总理打断他的话说：“让他们（科学家）先说。”

在江青面前，科学家们知道要是吭了气必将大难临头，他们又看到江青对来自美国的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政道都如此骄横霸气。他们哪还敢吭气。周恩来点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名：“吴老先说说吧。”吴有训不吭气。

在扯了一些与李政道建议无关的话题后，周恩来正式表态了，他对李政道说：“你的建议我们要研究，重视，方法可以不同。”周恩来还没说完，江青又强调“我们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言外之意仍是不同意李政道在少年中选拔尖子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路子。周恩来则进一步明确对李政道说：“你说的完全可以试验一下，只是千分之一嘛！”

周恩来看江青一而再的“顶”李政道的建议，但又不好再跟江青“顶”起来，他很机智地问李政道：“（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这个问题你看有没有阻力？”李政道很理解周恩来问他这个问题的含义。今天会见中江青等“顶牛”不是充分说明了阻力的存在嘛。所以，李政道也会意地回答说：“我想阻力是会有有的。”

会见结束，李政道一行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发现人们对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知识了解太少，这也许是一些人对他的建议不理解或不置可否的原因吧。为此，李政道取消了原定当晚去天安门漫步观赏的安排，用中文写了一份《关于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这份说明用通俗、简练的文字阐明什么是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李政道说：“什么是基础科学？就物理来讲吧，宇宙间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演变都有它们的规律。星球、星云的变化过程是有一定规律的，原子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是有一定规律的。核和基本核子的构造反应，也是有它们的规律的。可是，这些不同事物的规律又基于一组共同的基本规律。要了解 and 掌握这组共同的基本规律就要去研究基础科学。

“掌握了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将这些规律反复地、螺旋式地循环应用，这就产生了应用科学。今日的应用科学是基于过去的基础科学的成就。现在觉得有用的应用科学项目，如激光、电子计算机、核反应堆，在二三十年前是没有的，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过去在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基础科学上的成就，而目前有用的应用科学不见得在二三十年以后，还都有同样的用处。

“要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得有今日的基础科学。所以，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问题恐怕是不能忽略的。”

李政道用了一个晚上撰写这份《补充说明》。他第二天一早就把《补充说明》呈报给周恩来，同时，给参加5月24日会见的所有人员都印发了一份。他想把道理尽量说清楚，让中国领导人更理解他希望祖国科学和基础科学教育迅速健康发展，使祖国早日更强盛起来的真诚心愿。

#### ◇ 毛泽东当“裁判”

在北京逗留的几天中，他虽然忙于各种参观、座谈、讲学活动，但心中时时记挂着他这次回国为振兴祖国科学教育提出的第一个建议的命运，能否被中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

5月30日，也就是李政道夫妇拟结束北京访问的那天早晨6点钟，李政道还未起床，就接到一个令他意外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即将接见他和他的夫人一行。

不到8点，李政道一行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已坐在沙发上，看到李政道一行来了，就起立与李政道握手。落座后，毛主席知道李政道在上海长大，就幽默地问：“有上海，有没有下海？”李政道虽说在上海长大，但从未听说过下海，便回答说：“不知道。”毛泽东说：“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对称了。下海是一个镇子。”李政道对毛泽东知识渊博而深感钦佩。

毛泽东很快切入了正题：“你提的培养人才的建议我是赞成的。但是，你的那个理论没有讲清楚。”

李政道听毛泽东说赞成他提出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非常高兴，担虑多天的建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有了最权威的答案。但是，毛泽东又说“理论没讲清楚”又使他心中泛起不安。

毛泽东接着说：“理论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应用科学来的，然后又指导应用科学。”李政道听了断定，毛泽东没有看到他的《补充说明》。由于自己在建议书中，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阐释不够充分清楚，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同科学上的阐述是有差异的。

于是，李政道向毛泽东阐释了自己对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观点。李政道说，从科学上看，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础科学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应用科学也有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基础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应用科学是以基本规律为指导进行创造发明。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启示或为应用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或规律性指导。

同毛泽东这次的会面和交流，使李政道深受鼓舞。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建议的肯定，不仅对发生在人民大会堂的与江青的争论作了结论，也为中国政府采纳实施这项建议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当时的中国，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必定会得到贯彻实施的。

在周恩来主持人民大会堂西厅的接见时，郭沫若、吴有训、周培源等老科学家对他的建议不吱声，李政道当时也困惑不解。因为，这些老科学家都深知基础科学的重要和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重要和紧迫，但是为什么不表态呢？

接见以后，李政道和夫人秦惠?先后从老朋友和在祖国的亲属交谈中，他们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在江青等人面前，科学家都属“臭老九”，都是要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斗倒斗臭的。仅仅因为中央的保护才免遭批斗。“你是美国人，又是应邀来访的贵宾，顶了江青没事，那些老科学家要是像您这样同江青‘对阵’，早就被揪出来‘斗倒、斗臭’了，弄不好还得坐班房呢。”

李政道夫妇听了，连连“呃，呃”若有所思，他们很理解这些老科学家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他们还知道，就在周恩来主持接见他们的时候，国内正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是在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困境中，对他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表示支持，提出“完全可以试一下”是冒了政治风险的，是很不容易的。幸好毛泽东也表示“赞成”，才算以“建议被接受”而告终，要不，不知会生出什么风波来。

李政道听了惊愕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最后还要交代：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李政道提出的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终于得到贯彻，但是，也拖了近四年时间，其间遇到的困难与阻力可谓“山重水复”。直到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在方毅同志担任副总理、主持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后，贯彻落实李政道的建议的工作才放到了议事日程。这年三月，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了“少年班”，这是我国开辟的“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第一期招收了21名学生，平均年龄14岁，最小的是11岁。

在美国的李政道得到消息后欣喜不已，他特地发来贺电：“人才代出，创新当少年；桃李天下，教育数科大。”

少年班从1978年开办以来情况相当好，到2002年已经招生26期共999名少年大学生，毕业767人。1985年，在“少年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教学改革试点班”，到2002年已招收18届共727人，毕业432人，据统计，在“少年班”毕业的学生中，80%考取了国内外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三分之一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许多人成为科技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各种科学奖项的得主。

长期在李政道身边工作的季承先生对我说，李政道教授提出在少年中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是在“文革”动乱的特殊时期，那时，他先后于1972年、1974年来到中国访问，亲眼看到中国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了被破坏的困境，教学陷于停顿，教师被打倒靠边，优秀学生去“接受再教育”了，基础科学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被否定、受歧视。科学事业，特别基础科学面临人才断档、后继无人的危境。李政道先生建议是希望经过他的呼吁能拯救中国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工作，冲击“极左”派对基础科学事业和基础科学人才培养的破坏。而不是仅仅强调从少年中选拔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看来，李政道教授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事实上，后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政道教授再次归国访问时，他一再强调要重视和振兴基础科学，应采取多种途径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特别是他主张派优秀青年到美国名牌大学去深造，倡导并亲自参与“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培养中国基础科学人才的活动，在十年中培养了千名中国科技精英。

□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5期

~~~~~

【乱世人生】

戈华冥诞百年祭（上）

• 樊能廷 •

戈华原名郭念春、郭华，1919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郭吕村。1936年7月参加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为北京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党政“第二把手”。北大“文革”期间，1967年夏，北大分为两大派后，戈华表态，坚定地站到反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一边，并被“井冈山兵团”宣布为“三结合”对象，因此戈华惨遭聂孙集团的残酷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任林业部党组成员、教育局局长。1982年12月离职休养。1996年3月22日凌晨3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一、戈华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表现

1964年7月开始，北大作为中宣部十个试点单位之一，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亦称“四清运动”），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以左打左”和“姓陆的整姓陆的”党内斗争。这方面情况拙著《北大文革简史》有些“社教运动”波澜起伏的叙述，2019年又见到原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自印本《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详细地引用“老档”资料，叙述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始末。

1965年3月5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及北大校党委常委做报告，陆定一宣布：把北大社教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小组，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戈华、彭珮云。由八人小组来领导北大社教运动。陆平、彭珮云是前期挨整，后期整人的。

4月6日张子意传达：“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的话。

4月28～29日扩大为全体工作队员会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张子意、许立群总结了北大社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工作队长张磐石拒不执行《二十三条》及

《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的错误。陆定一代表中央五人小组宣布：许立群代替张磐石任工作队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社教前期的斗争对象陆平、彭珮云和“社教积极分子”戈华都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

8月25～9月1日，陆平、戈华等七人在大会做了清理检查，各小组进行讨论。让他们在大会上作清理检查，按照当时运动的意思是“洗完澡”可以“下楼”了。

1966年1月31日，北大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和教务长崔雄崑（代表校党委）召开大会，按照工作队的口径，向从湖北参加“四清”回来过春节的师生中的党员介绍北大社教运动进展情况。这个时候，戈华和崔雄崑，已然跻身于北大“校党委常委”这个层级的“社教左派队伍”，被社教工作队“结合”了。

这样看，戈华在社教中，对于中央空降来的工作队“顺守”，对于陆平却是“本土逆反”。

二、戈华在北大文革初起、张承先工作组时期的境况

1966年5月25日下午，聂元梓等七人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当晚，陆平召开了一次校党委会，研究下午发生的事情，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崑主张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但大多数人不同意。

晚8点，校党委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还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校党委常委崔雄崑这两个“社教运动积极分子”拒绝出席大会。

5月29日，校党委常委开会，会上戈华、崔雄崑提出，我们的运动，势必牵扯到社教运动问题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北大党委能否搞好？群众对党委又相信又不相信，必须请求上面派工作队来。清楚地表达了戈华、崔雄崑对于陆平校党委的不相信。

因为北京的彭真“旧市委”垮了，戈华、崔雄崑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

6月1日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全文广播了北大聂元梓七人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大字报（在北大，又称为《五二五大字报》）。

6月1日夜，李雪峰任北京“新市委”负责人的身份尚未公诸于世，就以华北局名义，急调河北省文教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由华北局和北京“新市委”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护送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的“文化革命工作组”32人进校。

6月5日晚，工作组领导小组开会。张承先工作组的曹轶欧、刘仰峤推荐、介绍，认为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和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和陆平“黑帮”不是一伙的，在“旧校党委”内是进行斗争、受排挤的。会上决定吸收这二人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上报市委审批。

6月8日，吴德办公室通知，经请示李雪峰，同意彭林、戈华、崔雄崑三人参加张承先工作组领导小组。

张承先工作组领导小组会研究确定，由刘仰峤、曹轶欧成立专案小组，研究“陆平、彭珮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政治问题”；由戈华、崔雄崑负责抓教学、行政工作；杨以希抓组织工作；彭林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武振声负责外事、留学生工作；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任命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

顺便一说——2005年（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145页记述：“有人说，我曾经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但是，我自己不知晓此事，没有人通知我就任，我也没有参加过工作组的工作，更不知道我这‘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里。”

聂元梓不知道自己是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偏偏有史料知道，还为她的被免职鸣不平——1967年3月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大字报组编《大字报选

（四）》第32页，“红旗兵团红枪”拥聂批孔杨的文章《评孔繁、杨克明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说道：聂元梓同志却受张承先排斥打击，被张承先撤掉了原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把她排挤到哲学系。“红旗兵团红枪”的文章证明聂元梓“被任命为张承先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史有其事。

6月29日：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名单（负责人）如下：领导小组组长，张承先；组员，曹轶欧、杨以希、张德华、彭林、刘仰峤、武振声、戈华、崔雄崑。

7月17日，工作组办公室发出《通知》，北京市委决定，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由下列同志组成：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彭林、杨以希、武振声、郑希文、张德华；组员，曹轶欧、李芳林、杨文谟、戈华、崔雄崑、蔡润田。

聂元梓和戈华，按照其他机关院校的情形，本来在“文革”运动的第一时间，都该被当作“当权派”受群众冲击的。由于北大的情况特殊，他们没有被群众冲击，表现的却是“革命力量”面目。他们共同的“革命对象”是陆平、彭珮云“黑帮。”

这样看，戈华以“革命派”身姿进入“文革”，在张承先工作组时期，是受重用的，对于中央空降来的张承先工作组“顺守”，对于陆平校党委仍是“本土逆反”。

三、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抓捕戈华，多次殴打“批斗”摧残

1967年8月17日，北大反聂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造反总部”（简称“团”）、“新北大北京公社”（简称“○”）、“新北大红旗飘”（简称“飘”）、“新北大井冈山公社”（简称“井”）、“新北大东方红公社”（简称“红”），共举副校长周培源先生为领袖，结成五千人（亦说七千人）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声势浩大，正式形成北大两大派。周培源先生任勤务组组长，勤务组成员有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胡纯和、谢纪康等。在周培源影响下，又有著名教授季羨林、侯仁之、周一良、赵宝煦和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等陆续加入到这个批聂的群众组织里。

聂元梓一派势力认为，聂元梓“校文革”是中央承认、中央文革支持的权力机构，反对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就是错误，就是反动，所以极尽全力、不惜手段地打压对立派“井冈山兵团。”

戈华并没有参加井冈山兵团的活动，但是，聂派认为他“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于兹，开始了对戈华的打击、迫害。

1967年10月5日，“新北大公社”总部发出《关于揪斗戈华的严正声明》，要求井冈山兵团“立刻把戈华交出来”，斗倒、斗臭。（戈华亮相，站在了井冈山一边。“新北大公社”多次声言，“戈华是井冈山的黑高参”。）

10月9日，“新北大公社”召开“批斗三反分子戈华大会”。

12月3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从南口将戈华抓回北大。

戈华支持“井冈山”，聂元梓“校文革”视戈华为敌，戈华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寻踪追缉，从燕园到山西、山东，又从山东到昌平南口，终在南口被“缉获”。戈华从此落入聂孙“校文革—新北大公社”铁掌，惨遭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

中文系65级校友陈景贵2019年1月由“香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65—1970那几年我在北大》（电子书书名《陈景贵文革日记》）下册，第797页记述：“1967·12·7戈华被捉回来，今日下午进行了批斗。”同书第804页记述：“1968·1·11蒋绍愚发言讲井冈山的人员问题。……第一部分是走资派，如“锤与镰”是走资派戈华等，顽固站在十七年黑线一边”。同书第853页记述：“1968·5·20新北大公社除了准备武斗之外，还提出打倒牛灰〇（牛辉林）、戈华、樊立勤，摧毁反革命小集团。”

12月13日晚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再次批斗戈华。陆平、彭珮云、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也被揪上了斗鬼台，

1968年1月10日，“新北大公社”、“河北大学造反派”联合批斗戈华。

5月23日，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揪斗张侠。会后，游斗了陆平、戈华、张侠等“反革命黑帮”。

6月1日，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斗争了吴子牧、宋硕、陆平、彭珮云、戈华、张侠、王庆淑、陈守一等人。

杀鸡儆猴，聂元梓狠整戈华——戈华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指称“黑高参”，关押期间，被批斗、毒打，历经人身摧残，打掉两颗牙齿、打断两根肋骨。本来清癯的半大老头子戈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的晚年羸弱和早早离世，与他在“文革”期间遭到“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残害，不无关系。“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戈华的子女提起这段往事，还是悲从哀来，泣不成声。戈华去世，林业部给他写的《戈华同志生平》：“文化大革命”期间，戈华同志横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严重摧残。”——具体化，不就是北大“文革”聂孙统治集团对戈华的残酷迫害吗？——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以江青为核心，1967年4月12日北大“全校大会”上，聂元梓的头号帮凶孙蓬一喊出“我们就是江青派”的口号，在场的新北大公社群众欢声如雷，山呼不息，都有照片和录音资料存档的。

（未完待续）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十二）

• 吴中杰 •

（上接 1911d）

◇ 第四部分 艰难的转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头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捕。

十年“文革”，就此结束。

从此，中国政治有了转机，中国教育也有了转机。

但是，这个转折却实在并不容易。这里，有权力转移的问题，有体制转轨的问题，而且还有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变问题。

就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转变似乎更为艰难。由于长年的积淀，某些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已经变成集体无意识，因此，在新挂出的招牌下，往往会徘徊着旧精灵。要驱赶这些旧精灵，还需作出不懈的努力。

▲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四人帮”被捕之初，消息并没有马上公布。我最先是从孙桂梧先生那里知道的。这位老夫子一向消息灵通，也肯向我透露。有一天在第九宿舍后面的小路上碰到，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比较冷僻，他四顾无人，就悄悄对我做了一个手抓的动作，说：“龙虎山上那帮子人，被这样了。”我在吴剑岚先生家学中医时，孙老夫子常过来聊天，我自然听得懂他的隐语：龙虎山是张天师修道之所，而张天师者，即张春桥也。张春桥等人被抓，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我立即兴奋起来。他赶忙说：“现在形势还不明朗，上海滩上那帮子混账东西，必然在注意你的动向，你要装作若无其事，静观其变。”

不过两三天之后，校门口的地面上就刷出了打倒王、张、江、姚的大字标语。再过几天，消息公布，学校里已组织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了。

复旦是张春桥镇压学生运动的重灾区，整肃知识分子的试验田，本来应该有很大的反弹，但此时却出奇的平静，远不及两次炮打时的热闹。当年炮打张春桥的学生早已毕业分散，而教师们经过多年整肃，已是练就一种“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态，所以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并不过分激动，大家手持小旗，随队游行，跟喊口号，笑谈过往，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

教师们不太兴奋是有道理的，因为统治学校的还是四人帮派来的工宣队和他们扶持起来的革委会。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辛亥革命之后县城里换汤不换药的政权道：“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

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而这时的复旦权力机构，则连这种官称上的改变也没有，不但药是原药，而且连汤也还是原汤。激昂慷慨地批判“四人帮”的，不是被压迫的师生，而是执行“四人帮”整人指令的工宣队。他们一下子从镇压反张师生的打手，变成了受张春桥压迫的受害者，这叫人怎么能积极得起来？

正因为整人的人还在台上，所以尽管“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人们还是疑虑重重。有一位老同学从别的学校老远的跑到我家，劝我千万不要翻案。他说：“张春桥打倒了，你的日子一定会比以前好过，但不能提出翻案，一翻案，问题就复杂了，说不定会处理得更重。”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觉得政治形势既已改变，政治角色也是应该转换的，何必再把反动角色扮演下去呢？何况，毛泽东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种事是不能消极等待的，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争取。所以尽管阻力重重，我还是要站出来说话。而你真敢站出来说话，别人倒也不敢拿你怎么样，因为他们骤失靠山，自己内心也很恐慌。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但为自己翻案，而且还要为难友翻案。蒋孔阳先生本来就木讷，从1958年以来一直挨整，被整得更加不敢讲话了，不管别人说些什么，他一概保持沉默。我实在看不过去，在那天全系辩论会上，说完自己的事后，顺便就为蒋孔阳申冤。我说：

“与我同时被打成‘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幕后人物的，还有蒋孔阳，他长年研究西方美学，研究得木头木脑，与青年学生毫无联系，你们看看他这副样子，叫他指挥黑格尔、白格尔还可以，叫他指挥红卫兵，他能指挥得动吗？说他是胡守钧后面的长胡子人物，真是荒唐透顶！”说得人们哄堂大笑，也没有人敢出来反驳。这形势鼓舞了孔阳先生，他在下午的大会上勇敢地站出来，作了全面的发言，讲得哀而动人，效果很好。

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回来挨批判的学生们，都纷纷回校要求平反，场面比后来任何一次校庆都更为热闹。最精彩的一幕，是劳元一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的发言。劳元一本来口才出众，现在一旦复居主动地位，真是锐不可当。他直指着会议主持人、工宣队清队负责人唐金文的鼻子，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连讽刺带挖苦，引得满场掌声。他还引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话，指责他们是“以人血染红顶子”，说得原来惯于张牙舞爪的唐金文，哑口无言，狼狈之极。工宣队这才领略到知识分子的智慧 and 口才。臭老九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岂是他们这些专靠整人吃饭的人所能抵挡得住的？工宣队的头头们大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在高等院校的统治，正应了罗隆基当年的一句话：“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其实，工宣队之所以能在高校中横行霸道，宣称能将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镇在五指山下，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中有一张符咒，贴在山上，使孙猴子不能翻身，一旦符咒失灵，五指山又有何用？

我已经记不清楚工宣队是什么时候离校回厂的了。因为他们进校时是敲锣打鼓、威风凛凛地进来的，离校时却是灰溜溜、静悄悄地走的。总之，不久之后，原党委代理书记王零复出，掌握全面工作，那时，工宣队还没有撤离，但已不那么威风了。

王零在被打倒之前，整起人来也是蛮厉害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为了保自己、保党委，把学术权威当作“穷寇”来追，弄得许多知识分子吃尽苦头。但在“罢官”之后，倒明白了许多事理，此时复出，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他和当时复出的组织部长李庆云一起，尽了极大的努力来做这项工作。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是“文革”期间上海第一大案，又是张春桥亲自处理的反张案件，要平反冤假错案，此案必然首当其冲，所以复旦对此案相当重视。听说此案的平反材料上报到上海市公安局之后，复出的公安局长黄赤波也很积极。因为当初处理此案时，公安局的干部本来就不同意，认为于法无所依，结果受到张春桥们的批判，还处分了几个人，案子被硬定下来。所以为胡守钧案平反，同时也就为许多公安干部平反。

胡守钧案平反之事，尽管校领导和公安局领导都很积极，但仍拖了很久。这也是打击起来雷厉风行，平反起来曲折拐弯的老习惯。

不但案子拖得很久，我辈发表文章也很困难。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鲁迅研究著作，寄给《文汇报》。“文革”以前，我是《文汇报》的经常撰稿人，关系一向不错，他们收到我的文章后，立即排出校样，表示准备发表，但却一直压着，就是发不出来，而上海市革会写作班下属《鲁迅传》写作组石一歌的文章，却仍旧照发不误。我一打听，原来是上海新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的指示，他很欣赏石一歌，说仍要发表他们的文章，报社不能不照办。当时还不知道“凡是派”的名称，但觉得这种受压迫者仍旧受压，受信任者依然受信任的事，总有些不对劲。最近看到一位原石一歌成员的文章，大谈车文仪部长对他的重视，这就证实了当时的传闻。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是工宣队或是“凡是派”，都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无论是平反工作，还是改革工作，都积极地向前推进着。

我的那篇文章压了半年多，终于在1977年6月7日见报了。一位朋友很坦率地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有些退步了，这篇文章还不及文革以前写得好。”这是老实话，其实也并不奇怪。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搁笔十年再写文章，自然是文笔生涩了。但这篇文章倒是影响很大。读者不在乎文笔的好坏，只是看到作者的名字，就很感兴趣，人们纷纷议论道：“吴中杰发表文章了，胡守钧集团的案子平反了。”因为当年批斗“胡守钧小集团”是大张旗鼓，全市皆知，而如今平反，却并不宣传，所以这篇文章在无意中成为一种信号，起了亮相和宣传的作用，也可见胡守钧案在市民中影响之大。后来77级学生入学，系里安排我担任这个班级的“文学概论”课，许多同学对我说：“吴老师，我们早就认识你了。”他们就是从大字报和批斗会上认识我的。

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我们常常参加平反会和补开的追悼会，一方面觉得沉重，另一方面也充满希望。

### ▲ 而今迈步从头越

大学者，顾名思义，应该是学习的机构，但长期以来，却变成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带，体力劳动者的储备场所。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就没有停过，1957年以后，下乡下厂更是家常便饭。

1978年，系里曾经统计过各位教师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那时，我工作刚满21年，下乡下厂及在校参加挖防空洞等劳动时间，合计有14年之多，恰好占总时数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时间也大都是搞运动搞掉的，所以这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怎么读书。从21岁到40多岁，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啊！

当然，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人没有下放劳动，有些人““四清”运动”只搞一期，还有个别积极分子，由于工宣队的偏爱，根本就没有下干校，也不下工厂，不过，他们的劳动时间少了，政治任务却重了，也没有时间读书。大家都在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大家都在不断地改造思想。

当时统计劳动时间的目的，是要根据各人劳动时间的多少，重新安排下乡下厂日期的。因为当时正在搞“拨乱反正”工作，“乱”者，“文革”之所为也，“正”者，“文革”以

前17年之体制也。这就是说，还要按照“文革”前的模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们的劳动服都不敢丢掉，以备随时披挂上阵。我那几件千补百衲的劳动服，直到好几年以后搬家时，才清理掉。

但在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时明确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要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学校则以教学和科研为主，而且说是要保证搞业务时间不得少于六分之五。

我们听了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央文件，都很高兴，觉得这一下子可以坐下来读书、教学、研究、写作了。但在老轨道上滑行惯了的人，要转到新轨上来，也不很容易，有时仍会沿着习惯性思路行动。比如，习惯于天天开会的人，要他把教师的会议限于每周一天或两个半天，就很困难。因此常常会有临时会议要开。这是现在习惯于每周开半天会的青年教师所难以理解的。记得有一天没有会议，我把唯一的一件外衣洗掉了，就安心地坐在家里看书，不料到得8点多钟，系里却打传呼电话来通知我去开会，因为这是临时通知的额外会议，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外套刚洗了还没有干，不能去开会，一时传为笑谈。但好在那时大家都穷，没有换洗外衣不是什么丢人之事。

那时，工资开始增加了，但加了一级，也只有72元，仍旧很紧张。稿费也恢复了，但只有象征意义。1978年4月，我和高云在《文汇报》发了一大版批评《虹南作战史》的文章：《反形象思维论的畸形儿》，总有8千字，去掉标题和各处空格，大约作7千字算，每千字4元，所得稿费只有28元；同年11月，我们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14万1千字，第一次印刷5万本，3个月内售完，所得稿费4200元。出版社告诉我：在本社的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不再支付稿费；在别家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支付一半稿费——千字4元；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才给全稿费——千字8元。当时虽然觉得这种算法实在太抠门，但也无处可以说理。可见要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稿费标准，也很不容易。

更令人讨厌的是，领导上整人的习惯也难改。虽然中央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但有些基层领导对于不顺眼的人，总还是想整一整，否则，就不能显示出他的威力。所以到得80年代初，我还挨了一次整。起因是中央有一份大报，派人来外调中文系一位毕业生，说是要提拔他做副总编，我对这位学生印象不错，就说了几句好话，却不料因此而触犯了时忌。据一位系领导说，这个学生在运动初期参加过造反派，吴中杰竟然为他说好话，这就是为造反派翻案，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与中央唱反调。而且居然有人站出来揭发，说他听到吴中杰与外调人员吵架，于是罪莫大焉。这种揭发批判，得到了系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我又成为中文系的重点批判对象，而且逼着教师们起来揭发，一时弄得非常紧张。只是“文革”时期，我的罪名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则改为“肯定文化革命”了，而批判者，则还是那些人。

但时间毕竟到了80年代，被批判者总算获得了自我申辩的权利。我找到校党委副书记，说明我的观点：第一，作为教师，为自己的学生说几句好话，有何不可？他在运动初期参加造反派，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又没有做过打砸抢之类的坏事；第二，那家报社派人来外调，明确说是要提他为副总编，我也认为他可以提升，观点一致，怎么会吵架呢？即使与外调人员吵起架来，又有什么了不起！不信你们可以派人到北京去外调；第三，这位系领导在“文革”时期就做系革委会副主任，“四人帮”批斗我的时候，他就坐在主席台上做帮凶，他为什么自己不清查清查？

北京这家报社似乎全不理睬复旦的风浪，不但依然提拔这位学生做副总编，而且不久又提他为总编；中文系对我的批判最终也不了了之。后来中共复旦纪委书记到我家来安抚，我提出中文系领导应该向我道歉。这位纪委书记说：“老吴啊，这件事就算了罢，不要太认真了，我们从来没有道歉的习惯，不继续整下去，就说明你没有错。”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有些老师知道此事后，也对我加以宽慰。陈子展先生说：“他整人是习惯性动作，一向如此，也未必特别对你有意见。”鲍正鹄先生说：“他是雨果《悲惨世界》里的暗探沙威，总想要追捕什么人，这是他的职业习惯。”这些话说得不无道理，虽然他们未必知道其中还夹杂着别的人事关系和别的意图。有一次，上面布置下来要批判一部电影，这位领导作了激昂慷慨的发言，骆玉明开他的玩笑，说：“你真有办法，能够看到这部电影，我们怎么就看不到？”该领导竟听不出来小骆是讽刺他不看原作，跟风批判，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哪里看过这部电影，我是根据报上的批判文章来发言的。”说得别人在一旁发笑。

然而这笑声，却表现出一种觉醒。群众已经不愿意跟风批判，而要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一看，用自己的脑子来想一想了。这结果，是大批判愈来愈搞不起来，即使是有几次全国性的批判任务，大多数人也无动于衷。可见独立思考与绝对领导的确是相抵触的，过去批判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是为了树立绝对权威，绝对权威一旦动摇，则独立思想必然抬头，这是压制不住的历史趋势。

（选载完）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